

我国家庭教育投资的城乡差异 与空间格局演变

蔡文伯，黄晋生

[摘要] 家庭教育投资的快速增长极大弥补了我国公共教育财政支出的不足，而城乡家庭教育投资差距也逐渐成为阻碍社会稳定发展的难题。客观分析城乡家庭教育投资的现实水平以及差异变化有利于促进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也是推动教育均衡与教育公平实现的重要前提。文章采用泰尔指数对我国城乡家庭教育投资差距的空间格局变化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家庭教育投资能力在不断提升，不过农村家庭的教育投资水平相对较低；在1990—2016年间，城乡家庭教育投资差异表现出频繁的波动变化，不过全国、农村与各地区的内部差异都在逐渐缩小；此外，农村以及东西部地区的内部差异是全国城乡家庭教育投资差异变化的主要原因。因此，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教育投资力度，注重提高农村学校的基础设施水平与师资条件，推动农村教育环境的改善，同时要落实好对西部地区的各项教育优惠政策，加强对教育投资的宣传，转变居民的教育投资观念，促进家庭教育投资的稳定增长。

[关键词] 家庭教育投资；城乡差距；泰尔指数

一、引言

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是教育公平实现的基础，而城乡教育差距一直是制约我国教育公平实现的关键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

[收稿日期] 2019-05-23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深度贫困地区教育精准扶贫政策绩效的测度与评价研究”(71864032)。

[作者简介] 蔡文伯，石河子大学新疆少数民族教育发展教育政策研究中心，电子邮箱地址：caiwenbo2005@sina.com；黄晋生，石河子大学新疆少数民族教育发展教育政策研究中心，电子邮箱地址：674106943@qq.com。

的教育，这是现阶段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方略，也是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区域均衡发展的现实依据。改革开放40年的教育改革历程结束了我国教育积贫积弱的局面，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教育发展政策极大推动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建设的新篇章。家庭教育投资是以个人或者家庭为主体，为了提高个体的受教育程度或者知识技能水平而投入的人财物资源，通常情况下，又以家庭教育经费支出为主要表现形式。家庭教育投资水平的高低往往决定着个体接受更好教育的机会，对于个体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市场结构的改善、产业结构的优化以及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又赋予了家庭教育投资新的历史意义，提高家庭教育投资水平在阻断贫困代际流动、深化精准扶贫政策、推进乡村振兴与供给侧改革方面正在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在长期二元发展结构的影响下，城乡家庭教育投资差距也在逐渐凸显，2016年我国城乡家庭教育投资的绝对差值已经接近2.5倍，在新疆等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已经超过了3倍，过度扩大的投资差距阻碍着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也致使城乡发展失衡的历史诟病难以根除，日益成为影响区域均衡发展的社会难题。因此，要客观分析城乡家庭教育投资现实发展情况，科学把握城乡投资差距的历史演变规律，这是探寻教育体制症结、打破体制机制阻碍的前提，也是推动教育均衡、教育公平实现的重要保障，更是优化资源配置结构、实现区域均衡发展的现实依据。

那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家庭的教育投资水平到底怎样？家庭教育投资的城乡差异有着怎样的变动轨迹？哪些地区的投资差异更为严重？这些都是要重点探讨的问题。由此，本文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对我国城乡家庭教育投资能力的分布情况及时期变化进行对比描述，以泰尔指数的可分解性为基础探寻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并根据经济发展情况分别对不同地区的城乡家庭教育投资差异进行比较。主要的学术价值有以下两点：一是学术界关于家庭教育投资的研究较为广泛，但是利用面板数据对城乡家庭教育投资差异的分析相对较少，本文从宏观层面对城乡家庭教育投资差异的分析为相关研究提供了经验证据。二是利用泰尔指数的可分解性定量探讨全国以及各地区城乡家庭教育投资差异的主要原因，为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实证参考。

二、文献回顾

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社会各界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在不断提升，居民的家庭教育观念也在不断革新，但是受到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国家政策的影响，

家庭教育投资能力往往表现出时期与地域差异。进入新时代,坚持文化自信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具有保障性作用,而文化自信的根源之一在于教育事业的发展,补齐城乡教育差距的短板、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这是教育公平实现的前提,也是促进城乡均衡发展的关键。关于家庭教育投资的研究历来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纵观以往学者的研究主要从家庭教育投资的意义、影响因素以及差异表现等方面展开。

(一)家庭教育投资的意义与重要性

教育是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也是个体改变身份地位、提高收入水平的有效手段。20世纪60年代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概念后,关于教育收益的研究逐渐增多,人们开始更加关注教育对经济、社会、个体收入等方面的影响。不过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罗默与卢卡斯等人构建了包含教育因素的内生增长模型后,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巨大贡献才被人们从理论上完全认可,关于教育回报率、教育贡献率等方面的研究也逐渐广泛起来,家庭教育投资的重要性也被社会各界所认可。从近几年国内外研究来看,家庭教育投资的意义已经拓展的更加广泛,刘灵芝等(2013)基于明瑟方程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农村家庭教育投资进行了比较,认为低收入群体的教育回报率相对较高。Ou(2015)认为家庭教育投资的受益群体非常广泛,尤其在多子女家庭,家庭教育投资的经济外溢性更强。吴珍珠(2014)从文化整合的角度指出,对于少数民族群体,家庭教育投资的意义不仅局限于增加收入,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促进民族文化的整合以及子女的社会化。祝建华、郭晓娜等(2016)从代际流动的角度论证了家庭教育投资对缓解贫困的意义。Lunn等(2018)基于收入分配角度认为,家庭教育投资差异是造成未来教育机会与社会不公平的重要原因,改善家庭教育投资格局则是保障社会稳定的有效途径。

(二)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因素

我国历来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家庭一直是教育投资的重要主体,大量关于教育投入的研究也证实:家庭教育投资在弥补公共教育支出不足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正是由于家庭教育投资的重要性,异质性的投资水平也导致了教育差距的产生,并且,不同地域下教育回报率、政府教育支出水平、居民收入水平以及投资态度等方面的差异也影响着家庭的教育投资选择。例如,张辉(2009)、闫新华(2017)等在研究中对居民收入水平与家庭教育投资的关系进行了辨析。李亚伟(2011)、岳昌君(2017)从家庭背景方面分析了父母受教育水平以及邻里教育观念对教育投资的影响。谷宏伟(2013)、樊卓思(2016)则认为社会地位是影响家庭教育投资的主要原因。魏晓艳

(2018)、贾男等(2017)基于公共教育投入的外部性角度解释了家庭投资差异的成因。此外,随着社会对个体发展重视程度的提升,性别角色、学习能力以及教育期望等个体属性也被作为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因素, Lee(2010)在研究中指出,受到文化观念的影响,日本家庭乐意在男孩身上支付更多的教育费用。杨威(2012)认为我国流动人口在教育投资理念方面表现出独特性,家庭教育投资水平的高低主要受到期望、子女性别以及学习成绩等方面的影响,而与个体经济地位的关系相对较弱^[16],周皓(2013)在研究中也提出了类似观点。

(三)家庭教育投资差距的社会表现

家庭教育投资是居民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在“先富带动后富”、“农村支援城市”等政策指导下,国家经济状况得到了好转,东部地区、城市地区得到了优先发展,居民收入实现了快速增长,在国家财政支持下,城市义务教育率先普及,各类高等教育院校为城市居民大开方便之门,极大推动了我国城市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为城市经济增长与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奠定了基础。但是,受到经济发展与收入水平的影响,农村家庭在教育投资方面表现得更加谨慎,并且城乡家庭的投资差距也逐渐凸显。例如,侯小兵、张学敏(2012)将家庭教育投资细化为资料费、文体活动费、家教费等14个项目,其中有11个项目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距,并且农村家庭投资总额低于城市家庭。孙勤、陈启洸(2013)认为城乡家庭在教育起点、教育过程与教育结果方面均存在着明显差异,2002—2011年间农村家庭教育投资一直远低于城市家庭。袁诚(2013)认为个体收入也是教育投资差距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中高收入家庭更愿意支付家教费,钱晓焯等人(2015)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结论,并且指出外地农业户口家庭在教育投资方面要承担更高压力。Surachman等(2015)认为城乡家庭教育投资的模式决定着贫困代际流动的持续时间,城市家庭往往表现出更积极的教育投资态度,加快了子女脱贫的速度。杨晔、徐研(2016)认为农村家庭教育投资存在着较大的不稳定性,受限于土地禀赋差异,农村家庭在教育投资方面相对消极。Majid(2018)认为多子女家庭往往会出现“偏袒”现象,即对不同子女的教育投资存在着差异性,尤其在低收入家庭,这种现象更加普遍。

可见,家庭教育投资对个体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不同因素的作用下,家庭教育投资表现出地理、个体的多方面差异。随着国家对农村地区重视程度的加强以及各项农民减负政策的落实,农村居民的教育观念开始逐渐转变,家庭教育投资日益成为居民日常消费支出的一项重要内容,也在逐渐影响着城乡家庭教育投资差异的变化。梳理以往研究,本

文拟利用泰尔指数方法对我国城乡家庭教育投资的差异情况进行实证分析,余文的安排结构如下:第三部分是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第四部分为城乡家庭教育投资能力的分析;第五部分重点分析城乡家庭教育投资差异及其变化;最后为结论与建议。

三、研究方法 with 数据说明

(一)家庭教育投资区域差异的测算方法

研究采用泰尔指数对城乡家庭教育投资的区域差异进行测算,泰尔指数的优势在于能够将总体差异进行区域分解,从而测量出样本区域间以及区域内部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程度,泰尔指数绝对值越大表明城乡家庭教育投资的差距越大,反之差距越小。

1. 当仅考虑全国层面城乡家庭教育投资差距时,泰尔指数可以分解为城乡区域差异、城乡内部差异两部分,公式(1)–(5)为全国城乡家庭教育投资泰尔指数及其分解公式:

$$T_{city} = \sum_{i=1}^n \frac{P_i}{P_{city}} \cdot \ln \left(\frac{p_i/p_{city}}{S_i/S_{city}} \right) \quad (1)$$

$$T_{rural} = \sum_{i=1}^n \frac{P_i}{P_{rural}} \cdot \ln \left(\frac{p_i/p_{rural}}{S_i/S_{rural}} \right) \quad (2)$$

$$T_1 = P_{city} \cdot \ln (P_{city}/S_{city}) + P_{rural} \cdot \ln (P_{rural}/S_{rural}) \quad (3)$$

$$T_2 = P_{city} \cdot T_{city} + P_{rural} \cdot T_{rural} \quad (4)$$

$$T = T_1 + T_2 \quad (5)$$

其中, T_{city} 、 T_{rural} 分别代表城市与农村内部的泰尔指数, P_i 为各省区总人口数占全国人口比重, S_i 为各省区城乡家庭教育投资占全国城乡家庭教育投资比重, P_{city} 、 P_{rural} 分别为城市与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 S_{city} 、 S_{rural} 分别为城市与农村家庭教育投资占全国比重, T_1 和 T_2 分别为区域间和区域内差异的泰尔指数, T 为总体差异的泰尔指数。

2. 当考虑地区层面城乡家庭教育投资差距时,泰尔指数可以分解为东中西三大地区间差异、各地区内部差异两部分。分解公式见(6)–(11):

$$T_e = \sum_{i=1}^n \frac{P_i}{P_e} \cdot \ln \left(\frac{p_i/p_e}{S_i/S_e} \right) \quad (6)$$

$$T_m = \sum_{i=1}^n \frac{P_i}{P_m} \cdot \ln \left(\frac{p_i/p_m}{S_i/S_m} \right) \quad (7)$$

$$T_w = \sum_{i=1}^n \frac{P_i}{P_w} \cdot \ln \left(\frac{p_i/p_w}{S_i/S_w} \right) \quad (8)$$

$$T_3 = P_e \cdot \ln(P_e/S_e) + P_m \cdot \ln(P_m/S_m) + P_w \cdot \ln(P_w/S_w) \quad (9)$$

$$T_4 = P_e \cdot T_e + P_m \cdot T_m + P_w \cdot T_w \quad (10)$$

$$T = T_3 + T_4 \quad (11)$$

其中, T_e 、 T_m 、 T_w 分别代表东、中、西三大地区内部泰尔指数, P_e 、 P_m 、 P_w 分别为东、中、西三大地区人口总量占全国人口比重, S_e 、 S_m 、 S_w 分别为东、中、西三大地区城乡家庭教育投资占全国比重, T_3 和 T_4 为区域间和区域内差异的泰尔指数。

(二) 家庭教育投资的指标选取及说明

改革开放初期(1978—1984年),我国仍然处于经济建设恢复期,恢复生产、解决温饱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居民的教育支出普遍较低,直到1985年我国城市家庭平均教育支出才超过了50元,而农村家庭在1989年的教育支出仍然在15元以下,1990年才达到了30元。因此,考虑到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城乡家庭教育投资的现实情况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重点对1990—2016年城乡家庭教育投资差异的变化情况进行分析^①。需要说明的是:

1. 重庆直辖市在1997年才正式成立,出于统计便利性考虑,将1997—2016年间重庆与四川数据进行合并,而西藏部分年份的数据有所缺失,故暂不考虑西藏,因此研究中共采用了29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并按照国家统计局标准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地区^②。

2. 在城乡家庭教育投资差距的分析中,研究采用的是省级层面的家庭教育投资数据,即每个省级行政单位包含城市与农村两类数据,全国总样本数为58个,所测得的泰尔指数实际反映了58个样本点的总体差异。

四、改革开放40年城乡家庭教育投资能力的格局演变

(一) 城乡家庭收入水平

一般来讲,收入水平在家庭教育投资方面起着基础性作用,收入水平的

^① 本文中所采用的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83—2017)、《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2008)、《新中国60年》(1949—2009)。

^② 按照统计局划分标准,东部地区包括北京、河北、天津、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11个省级行政单位;中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个省级行政单位;考虑到重庆与西藏的特殊情况,本文中西部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甘肃、陕西、宁夏、青海、新疆、内蒙古、广西10个省级行政单位。

高低决定着教育投资的预期,为了便于比较,本文分别采用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纯收入对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进行衡量^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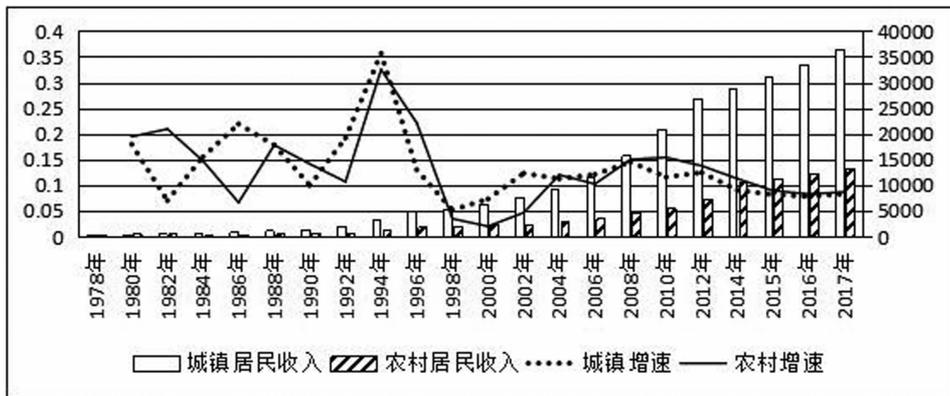


图1 城乡居民收入(元)变化趋势

从图1中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都得到了显著提高,2017年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分别达到了36000多元与13000多元,较2000年增长了4.8倍与4.9倍;但是,对比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可以看到,城市居民收入远高于农村,2017年城市居民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2.7倍多,城乡收入差距非常明显。再来看收入增速的变化,1979—1988年间,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呈现出相反的变化,1990与1992年后城乡居民收入分别出现了短暂的快速增长期,并且均在1994年达到了最大值,在1994—1998年又快速下降,1998年后城乡居民收入开始进入一段相对稳定的增长期,仅在个别年份出现了小幅波动,在2008年后开始逐渐下降,不过近年仍然保持在8%左右的增幅。此外,在2008—2017年农村居民收入增速一直高于城市,但是城乡收入增速的差距一直很小。

(二)城乡家庭的教育重视程度

改革开放后,我国教育体制改革工作开始步入正轨,随着科教兴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以及农村综合教育改革等多项战略性教育政策的实施,教育事业得到了极大发展,教育在经济增长与社会就业方面的重要作用也开始逐渐凸显,居民对教育投资的重视程度也被逐渐唤醒。图2反映了我国城乡居民在1978—2017年家庭教育投资的变化情况,采用城乡居民文教娱乐支出代替教育支出,以文教娱乐支出与总消费支出的比值衡量居民对家庭教育投资的重视程度。

^① 2013年后由于统计口径变化,采用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代替农村居民纯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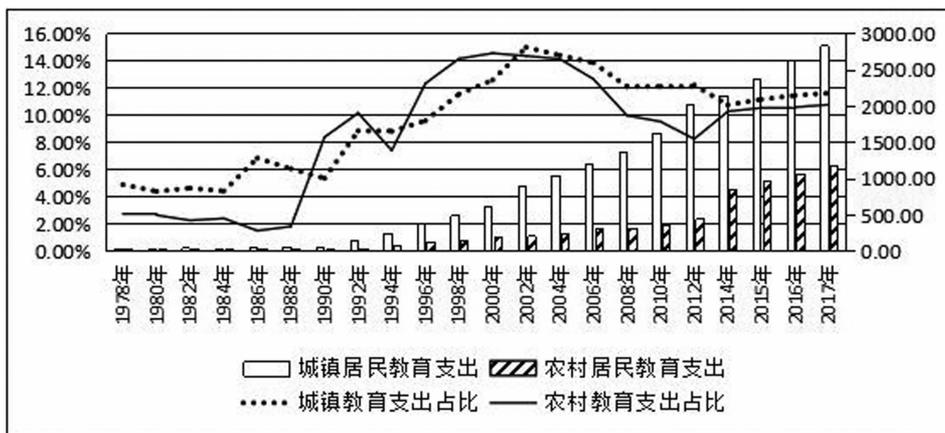


图2 城乡家庭教育支出(元)比较

从图2可以看到,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城乡家庭教育支出都得到了极大增长,2017年城乡家庭教育支出分别达到了2800多元与1700多元。不过从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重的变化情况来看,家庭教育支出基本上是在1985年左右才开始逐渐增长,在2002年左右达到高峰,2002—2004年间城乡家庭教育支出占比基本上都保持在14%以上,2002年后的10年间在逐渐减小,2014年后又开始逐渐上升。从上述描述过程来看,城乡家庭教育支出基本上是围绕着国家相关教育政策而变化。

改革开放初期(1978—1984年)我国正处于经济建设恢复阶段,百业待兴、百废待举是这一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维持温饱、恢复生产是家庭生活的主要内容,一般家庭的教育投入相对有限。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简政放权”、“扩大自主办学的权利”成为教育事业发展的主要指导思想,地方政府在教育事业发展中开始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地方政府与居民教育投资的积极性,为教育财政的增长提供了重要动力;1999年统招统分政策逐渐取消,高校扩招政策开始推行,经济发展对高学历人才表现出更强烈的市场需求,加剧了人才竞争的激烈程度,为家庭教育投资的持续增长奠定了基础;但是这一时期“乱收费”等问题也层出不穷,加剧了居民的教育负担,变相抬高了居民家庭教育支出比例。2003年以后随着“两基”攻坚计划的逐步推行,极大缓解了西部地区的家庭教育负担,2006年我国又出台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进一步为农村家庭教育减负提供了政策保障。不过,国家公共教育支出的增加也对家庭教育支出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导致2002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城乡居民家庭教育支出增速在不断下降。2010年国家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

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央与地方进一步细化了教育经费的分担比例，均衡发展的战略目标更加清晰，居民的教育投资选择也更加理性，这一时期城乡家庭教育支出只出现了小幅波动。

五、改革开放40年家庭教育投资的城乡差异分析

(一)全国层面城乡家庭教育投资差异的时期变化

图3反映的是1990—2016年间我国29个省份城乡间、城市内部以及农村内部的泰尔指数变化情况，全国层面的泰尔指数实质上反映的是58个样本的城乡差距，而城市与农村内部泰尔指数分别反映的是29个城市与农村样本的内部差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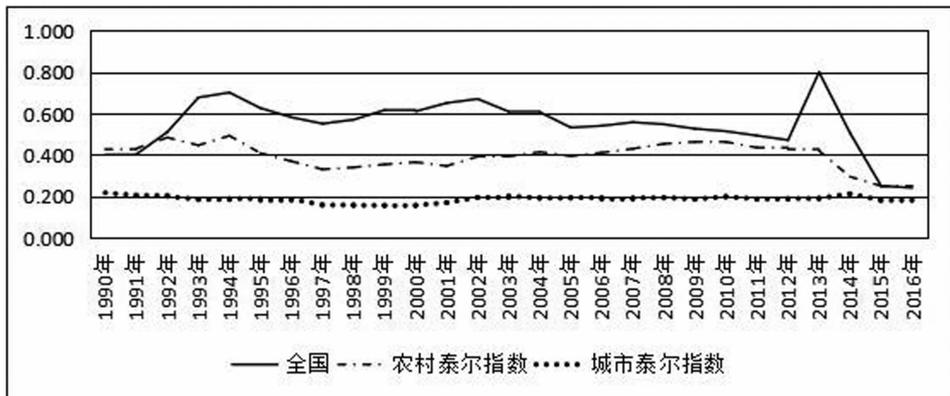


图3 全国层面、农村及城市家庭教育投资泰尔指数

从图3来看，1990—2016年间全国城乡家庭教育投资差距的波动变化比较明显，样本期内出现了多个峰值，按照泰尔指数的升降过程可以划分为多个变化期。其中，1990—1994年、1997—2002年与2012—2013年在不断扩大，其中2012—2013年差距扩大速度较快，并且在2013年泰尔指数达到了最大值；而1994—1997年、2002—2012年与2013—2016年则表现出缩小的趋势，尤其是2013年后缩小速度非常明显，2016年泰尔指数已经下降到0.25左右。再来看城乡内部家庭教育投资差距的变化情况，1990—2016年间城市内部泰尔指数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基本上稳定在0.2左右，而农村内部差距则相对较高，并且一直处于波动变化的状态，1993—1999年农村内部与全国泰尔指数的变化趋势相似，但是在2001年以后农村内部的泰尔指数开始不断上升，而2002年后全国泰尔指数在波动下降，2010年农村地区泰尔指数也开始不断下降，并且到2016年已经降到0.25左右。

表1给出了全国城乡家庭教育投资泰尔指数的分解情况,主要由区域间与区域内差异两部分构成,其中区域内差异又由农村内部差异与城市内部差异构成。

表1 全国层面城乡家庭教育投资泰尔指数的分解情况

年份	区域间差异贡献度	区域内差异贡献度	农村贡献度	城市贡献度
1990	0.044	0.956	0.843	0.113
1991	0.049	0.951	0.844	0.107
1992	0.173	0.827	0.742	0.085
1993	0.428	0.572	0.511	0.061
1994	0.399	0.601	0.539	0.063
1995	0.435	0.565	0.497	0.069
1996	0.442	0.558	0.480	0.078
1997	0.478	0.522	0.451	0.071
1998	0.485	0.515	0.447	0.069
1999	0.508	0.492	0.427	0.064
2000	0.491	0.509	0.442	0.067
2001	0.540	0.460	0.390	0.069
2002	0.497	0.503	0.422	0.081
2003	0.448	0.552	0.453	0.098
2004	0.431	0.569	0.472	0.097
2005	0.380	0.620	0.504	0.116
2006	0.375	0.625	0.512	0.112
2007	0.370	0.630	0.517	0.114
2008	0.330	0.670	0.552	0.118
2009	0.299	0.701	0.582	0.119
2010	0.276	0.724	0.592	0.132
2011	0.293	0.707	0.575	0.132
2012	0.273	0.727	0.585	0.142
2013	0.578	0.422	0.336	0.086
2014	0.477	0.523	0.369	0.154
2015	0.158	0.842	0.433	0.409
2016	0.132	0.868	0.434	0.434

从表1中可以看到,1990—2016年间全国城乡家庭教育投资差距主要是

由城乡内部差异造成,除了个别年份,区域间差异的贡献度基本上保持在50%以下。1990—2001年区域内部差异总体上在不断缩小,并且到2001年已经下降到46.0%,不过2001年后区域内部差异又开始逐渐扩大,仅在2013年出现了下降。此外,区域间差异与区域内部差异的变化呈相反趋势,在此不做过多赘述。

通过对比全国、城市与农村内部泰尔指数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过去一段时期,我国城乡家庭教育投资差距一直处于相对较高水平,泰尔指数大部分时期保持在0.5以上,并且波动变化非常频繁,而这种现象的出现可能主要受到农村地区内部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不过2012年后城乡差距总体上在逐渐缩小。

上述现象产生的原因在于,1978年以后国家逐渐开始招收“收费走读,不包分配”的大学生,之后10年间的高等教育收费制度改革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扩大自费生比例展开,1989年我国正式确立了“双轨制”收费系统,国家与个人共同成为了高等教育的负担主体,但是公费生、定向生与自费生的缴费标准存在着较大差异,这也导致在1990年后的一段时间全国家庭教育投资差距的小幅上升。1992年后在探索市场经济的宏观政策引导下,国家逐渐改变了对教育事业的包办态度,民间办学、多渠道筹措经费成为这一时期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主要特征,尤其在1994年推行分税制后,地方在教育发展方面的自主权进一步扩大,各类学杂费、资料费、辅导费也成为居民日常消费的刚性支出,从而间接推动了农村内部教育投资的短期均衡;1998年后是我国全面实施科教兴国的重点时期,高校扩招等一系列政策相继出台,也激发了居民的教育投资热情,尤其对于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支出已经成为家庭教育投资差距的主要成因,甚至很多农村家庭由于无力支付高额学费而选择让子女辍学。2006年随着《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与《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收学杂费的实施管理办法》的出台,农村地区开始逐渐免除学杂费,极大缓解了农村家庭教育负担,推动了全国家庭教育投资差距的缩小;但是公用经费支出对农村家庭教育投入的挤出效应也更加明显,从而导致2007—2010年间农村内部差距的不断扩大,并且农村内部差距的贡献率也在这段时期表现出上升趋势。2010年教育规划纲要的出台揭开了我国教育体制深化改革的序幕,也进一步明确了教育在国家发展中的战略性地位,国家保障性教育经费支出得到了显著增长,为农村内部教育投资差距的缩小奠定了基础。2012年教育支出占GDP总量首次达到4%,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得到了极大增长,但是这种超常规的教育投入也导致2013年公共教育财政支出增速的相对放缓,变相加重了城乡家庭的教育负担,并且随着“异地高考”政策

的出台,各省份的招生规模逐渐扩大,城乡家庭教育投资差距更加凸显。2015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在“两免一补”、乡村振兴、教育精准扶贫等国家政策的扶持下农村经济与教育都得到了极大发展,极大改善了农村的落后面貌,促进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整体提升,也推动了农村家庭教育投资的内部均衡。

(二)地区层面城乡家庭教育投资差距的格局演变

图4反映的是我国1990—2016年间各地区城乡家庭教育投资泰尔指数的变化趋势图,东部、中部与西部地区分别测量了22个、16个与20个样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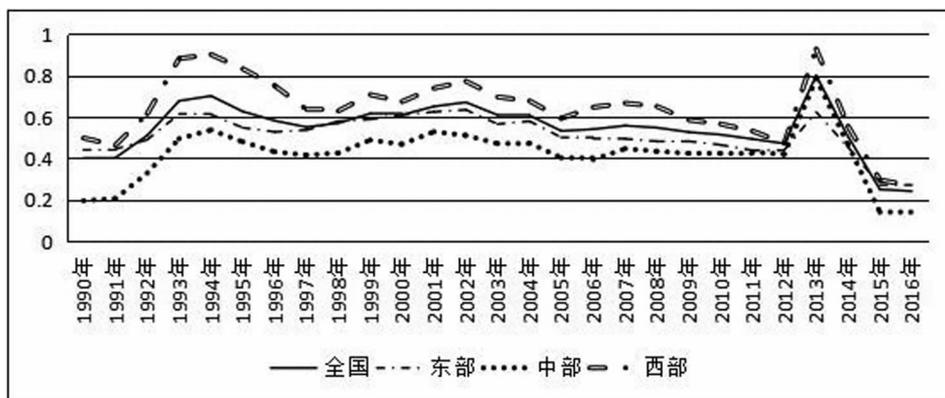


图4 各地区城乡家庭教育投资泰尔指数

从图4中可以看到,东中西三大地区家庭教育投资差距表现出相似的变化趋势,样本时期内,西部地区内部差异一直处于全国最高水平,并且波动变化的幅度也相对较大,2013年已经超过了0.9,不过2015—2016年泰尔指数又出现了大幅度回落,一度降到0.25左右,2012—2016年间泰尔指数的绝对差值达到了0.6以上。东中部地区泰尔指数相对较小,1992年以后,除了个别年份,东部泰尔指数基本上保持在全国平均水平以下,波动幅度也较为平稳,1993—2002年间保持在0.5—0.6左右,2002—2012年一直在缓慢下降,2013年出现异常上升后又快速下降,2016年已经降到0.27左右。中部地区的内部差异大部分时间处于全国最低水平,除了个别年份超过0.5以外,1992—2012年间基本上在0.4—0.5之间波动,2013年后也出现了大幅下降,2016年降到了0.13左右。

表2给出了分地区情况下城乡家庭教育投资泰尔指数的分解值,用于具体分析各地区对全国城乡家庭教育投资差距的贡献度。

表2 地区层面城乡家庭教育投资泰尔指数的分解情况

年份	区域间差异贡献度	区域内差异贡献度	东部贡献度	中部贡献度	西部贡献度
1990	0.068	0.932	0.414	0.165	0.353
1991	0.085	0.915	0.415	0.173	0.327
1992	0.078	0.922	0.361	0.219	0.342
1993	0.041	0.959	0.341	0.249	0.370
1994	0.047	0.953	0.327	0.260	0.365
1995	0.033	0.967	0.328	0.261	0.378
1996	0.040	0.960	0.340	0.253	0.367
1997	0.049	0.951	0.365	0.257	0.329
1998	0.051	0.949	0.380	0.255	0.315
1999	0.046	0.954	0.357	0.270	0.327
2000	0.049	0.951	0.374	0.261	0.315
2001	0.040	0.960	0.360	0.276	0.324
2002	0.058	0.942	0.354	0.259	0.329
2003	0.063	0.937	0.347	0.263	0.327
2004	0.058	0.942	0.357	0.265	0.320
2005	0.072	0.928	0.352	0.257	0.319
2006	0.067	0.933	0.342	0.248	0.343
2007	0.054	0.946	0.330	0.272	0.343
2008	0.062	0.938	0.327	0.269	0.342
2009	0.065	0.935	0.340	0.274	0.320
2010	0.067	0.933	0.336	0.279	0.318
2011	0.063	0.937	0.330	0.296	0.311
2012	0.061	0.939	0.348	0.302	0.290
2013	0.042	0.958	0.291	0.331	0.336
2014	0.036	0.964	0.336	0.310	0.318
2015	0.056	0.944	0.451	0.176	0.317
2016	0.055	0.945	0.471	0.173	0.301

从表2可以看到,分地区来看,全国城乡家庭教育投资差距主要是由区域内部差异引起,在样本时期内区域内部差异贡献度一直处于0.9以上的高水平,并且主要由东西部地区引起,东部泰尔指数一直稳定在0.29—0.48之间,西部泰尔指数稳定在0.29—0.38之间,而同期中部的内部差距则相对较

小, 2012年以前一直在0.3以下, 2013年达到最大值以后又出现了持续下降, 2016年已经降到与1990年相当的水平。对比各地区差距贡献度的变化趋势可以发现, 东中部地区的贡献度表现出相反性, 1991—1995年东部贡献度在逐渐缩小, 而中部在逐渐增大, 1995年以后东部贡献度又出现了短暂上升, 一直到1998年进入了缓慢下降期, 在2013年首次降到了0.3以下, 之后又呈现出快速上升趋势; 而中部贡献度在1995年以后逐渐稳定在0.25左右, 2006年以后出现了持续上升, 2012年以后呈现出与东部明显相反的变化趋势。

不难看出, 我国各地区城乡家庭教育投资差距表现出与全国相似的变化趋势, 即国家教育相关政策的实施对各地区的影响作用在方向上表现出相似性, 但是, 对比各地区泰尔指数的大小情况可以发现, 西部地区城乡家庭教育投资差距的波动更加剧烈, 即西部地区对国家政策表现出更强的依赖性, 也意味着西部地区具有较高的家庭教育投资弹性, 投资差距的变化也与国家政策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 而东中部城乡家庭教育投资对国家政策的依赖性相对较弱, 即家庭主观层面的因素可能是影响东中部地区家庭教育投资的主要原因。此外, 区域内部差距仍然是导致全国城乡家庭教育差距形成的主要原因, 并且尤以东西部地区的内部差距最为严重。

六、结论与建议

(一) 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家庭教育投资都得到了极大的增长, 本文在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基础上, 采用泰尔指数对城乡地区内部以及东中西三大地区的家庭教育投资差距进行了分析, 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城乡家庭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总体上在不断提升, 不过农村家庭教育投资水平一直相对较低; 1990年以后城乡家庭教育投资差距的波动变化非常频繁, 不过总体来看, 2002年以后无论是全国、农村内部还是各地区内部, 家庭教育投资差距都呈现出缩小的趋势, 而城市内部的投资差距一直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 农村内部差距以及东西部地区内部差距是全国家庭教育投资差距形成与变化的主要原因。

(二) 建议

1. 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力度, 改善农村教育发展环境。

全国教育发展的短板在农村, 农村发展的关键在于解决好“三农问题”,

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力度对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是要加大对农村学校的基础设施投入力度,推进老旧教学楼与危房的改造,充实理化实验室与功能教室的试验材料与教学器材,根据学校规模的实际情况,加快塑胶跑道与风雨操场的建设,逐步改善农村的基础办学条件,为农村生源的扩大提供良好的校园环境。二是要注重对农村师资条件的改善,加大对乡村教师的培训力度,鼓励教学名师送培送教下乡,提高现有教师队伍的教学水平;同时,要逐步提高农村教师的待遇条件,稳定农村的年轻教师队伍,提高农村教师的招聘比例,改善农村学校师资短缺的局面。

2. 加强对欠发达地区的教育扶持力度,转变家庭教育投资观念。

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教育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很多偏远地区的家庭缺乏对教育收益的理性认识,要进一步加大对这些地区的教育扶持力度,提高家庭教育投资力度。一是加强对落后地区的教育财政投入,落实好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逐步推广十五年免费教育,逐渐提高“营养午餐”“两免一补”等教育优惠政策的基础标准,减轻居民的消费负担,为家庭教育投资的增长提供良好社会环境。二是要注重对加强教育投资的宣传力度,转变居民的教育观念,摒除“教育无用论”等落后思想的传播,发挥教育在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方面的积极作用,鼓励居民提高家庭教育投资的比重。

[参考文献]

- 樊卓思, 2016:《贫困农村地区家庭子女教育投资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 Logistic 模型的分析》,《教育理论与实践》第 2 期。
- 谷宏伟、杨秋平, 2013:《收入、期望与教育支出:对当前中国家庭教育投资行为的实证分析》,《宏观经济研究》第 3 期。
- 郭晓娜, 2017:《教育阻隔代际贫困传递的价值和机制研究——基于可行能力理论的分析框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第 3 期。
- 侯小兵、张学敏, 2012:《教育均衡视角下城乡家庭义务教育投资的比较研究——基于后缴费时代的调查分析》,《现代教育管理》第 11 期。
- 贾男、刘国顺, 2017:《义务教育均衡化能否有效降低家庭校外教育支出》,《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第 1 期。
- 李亚伟、刘晓瑞, 2011:《我国居民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因素分析》,《统计与决策》第 17 期。
- 刘灵芝、黄悦怡、王雅鹏, 2015:《基于收入分层视角的农村教育投资与教育回报研究——兼对湖北省农村家庭的实证检验》,《农业技术经济》第 12 期。
- 钱晓焯、迟巍、史瑶, 2015:《义务教育阶段城镇家庭教育支出的构成及不平等:来自 2007 和 2011 的实证证据》,《教育与经济》第 6 期。

- 孙勤、陈启泷, 2013:《我国城乡家庭教育投资差异调查分析——以江苏省南通市为例》,《调研世界》第4期。
- 魏晓艳, 2018:《公共教育投入对个人教育投入的实证效应研究》,《复旦教育论坛》第2期。
- 吴珍珠, 2014:《文化资源整合、风险控制以及子女社会化问题——少数民族家庭的教育投资研究》,《贵州民族研究》第11期。
- 闫新华、杭斌, 2017:《收入不平等与家庭教育支出——基于地位关注的视角》,《山西财经大学学报》第5期。
- 杨威, 2012:《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期望的影响因素探析——基于北京市某区的问卷调查》,《西北人口》第2期。
- 杨晔、徐研, 2016:《土地经营规模与农村家庭教育投资行为——基于全国31个省887个行政村的实地调查》,《社会学研究》第6期。
- 袁诚、张磊、曾颖, 2013:《地方教育投入对城镇家庭教育支出行为的影响——对我国城镇家庭动态重复截面数据的一个估计》,《经济学动态》第3期。
- 岳昌君、周丽萍, 2017:《家庭背景对我国重点高中入学机会的影响——基于2014年高等教育改革学生调查的实证分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期。
- 张辉、史书新, 2009:《我国城镇居民家庭子女教育投资动机的影响因素分析》,《山东社会科学》第5期。
- 周皓, 2013:《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教育期望、亲子交流与儿童发展》,《青年研究》第3期。
- 祝建华, 2016:《贫困代际传递过程中的教育因素分析》,《教育发展研究》第3期。
- Lee, K. S., 2010, "Parental Educational Investments and Aspirations in Japan",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31(12): 1579-1603.
- Lunn, A. and S. Kornrich, 2018, "Family Investments in Education during Periods of Economic Uncertainty: Evidence from the Great Recessio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61(1): 145-163.
- Majid, H., 2018, "Child Endowments and Parental Investments: Intra-household Allocation in Oportunidades Families in Mexico",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2(1): 91-114.
- Ou, D. S., 2015, "The Universal Provision of Primary Education: Who Benefits?", *Education Economics*, 24(5): 511-535.
- Surachman, A. H., 2015, "Parental Investment and Poverty Dynamics in West Java, Indonesia", *Journal of Family and Economic Issues*, 36(3): 340-352.

Urban and Rural Differences and Spatial Evolution of Household Education Investment in China

CAI Wen-bo, HUANG Jin-sheng

(Education Development and Policy Research Center of Xinjiang Minorities, Shihezi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rapid growth of family education investment has made up for the shortage of public education expenditure in China, and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household education investment has gradually become a difficult problem that hinders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Objectively analyzing the real level of investment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family education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optimal alloca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for promoting the balance of education and the realization of education equi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patial pattern of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household education investment in China by using the Thiel index. The results show tha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capacity of rural and urban household education investment has been constantly improving, but the level of rural household education investment is relatively low. Between 1990 and 2016, the differences in household education invest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showed frequent fluctuations, bu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ountry, rural areas and regions were gradually narrowing. In addition, the internal differences between rural areas and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regions are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changes in the differences in household education invest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increase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in rural areas, pay attention to improving the level of infrastructure and teachers in rural schools, and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in rural areas. We will increase publicity about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change residents' views on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and promote the steady growth of investment in family education.

Key words: investment in family education; the urban-rural gap; Thiel index

(责任编辑: 孟大虎 责任校对: 孟大虎 孙志军)